

# 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後辉煌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王菊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库·史丛

12

以翔实的史料和详尽的数据为基础

展示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

上海棉纺织业的兴衰史

书中提出了众多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如民营企业的繁荣 国营企业的性质

美援棉花的作用 中国棉业的复兴

以及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

F426. 81

W239

# 从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王菊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库·史丛

12

73570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王菊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社会科学文库·史丛)  
ISBN 7-80681-395-0  
I.近... II.王... III.棉纺—纺织工业—工业史  
—上海市—1945~1949 IV.F426.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826 号

## 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

---

著 者 王 菊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姜 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20)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021-63875741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

ISBN 7-80681-395-0/K·094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本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作为作者的博士导师,我甚感荣幸。作者王菊,属于正在使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研究发生变化的新一代中国研究人员,得益于从祖国汲取的和在西方接受的双重教育。她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开始了研究历史的生涯。随后,她来到法国,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选修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引导她逐步改变了她所习惯的研究方法论。因此,这篇博士论文于1997年5月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通过答辩,当时就得到极大的好评。

得益于严格有效的训练,并以此为根基,王菊着手进行全新的研究,她选择的课题是她感兴趣的1945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个学术界了解得不够深刻的时期,因为这段历史曾被普遍地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从而使历史本身受到某些先验论的干扰。然而,在国共两党政权转换的阶段中,这段历史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对它的定性,取决于对1949年革命的解释:或者是剧烈的骚乱导致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在朝夕之间发生动荡,或者是它们仅属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逐步转型的一个阶段——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中某些社会形态得以延续的准备阶段。

王菊选择从经济入手来接近这段历史的方式也是独特的。为使调查研究的结论尽可能客观,她将统计资料的运用作为重点,而她所

持的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观点,也因此而面目一新。

按通常的解释,这种转型是出于以下原因:即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本书向我们展示的则是与此不同的另一场景:在当时的种种经济困难重压下,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上海棉纺织业,仍有过一个短暂的、充分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且,1945年和1946年期间上海纱厂的繁荣,并不亚于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1919到1921年,或1937到1941年间的两次迅速发展。

诚然,这次新的黄金时代的背景与前两次不同。作为竞争对手的日本纱厂,这个30年来一直抑制中国纱厂发展的障碍终于被排除了,上海的纱厂不必再与令其忧惧的竞争者分割国内市场了。同时,它们还可以把业务扩展到日本不再供给出口品的东南亚市场。但是,当帝国主义强权势力构成的威胁越来越淡化时,新的问题骤然产生:一个国营企业诞生了,这无疑将引起当时占绝对优势的私营企业的<sub>不安</sub>。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华资纱厂的繁荣和活力也即表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繁荣和活力。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了当时生产潜力总和几乎与民营纱厂相等的所有的日本纱厂,并把它们拥为国有,这一出于财政的迫切需要而做出的国有化决定,其实恰恰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则。由此,它不仅为社会论战提供了新闻,也挑起了社会力量的对抗和抵制。王菊在书中为我们显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民营企业在与享有各种优惠的国营企业的竞争中如何地艰难喘息,在身陷绝境的国民政府剥夺下,所有公私企业如何最终走向衰退;而导致纱厂资本和资本家流往国外、尤其是流向香港的衰退,又使大多数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对现政府产生反感,并在1949年做出了与新政权合作的选择。

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统计资料、尤其是各纱厂

数据的不可靠性,所以,王菊的工作范围很广,工作量很大。她必须寻找多样化的资料来源,以便更好地重新组合、研究这段历史。为此,她使用了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的档案和该会所做的综合资料,以及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末所做的初步研究资料(通常采用其中的采访记录)。此外,作者还得益于她的伯父王子建的历史见证和私藏档案。有必要指出,王子建先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曾是上海过渡时期众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

王菊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它使我们能够从此对1949年革命的前几年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济领域的运行和演变,有了确切、可靠的印象,也使我们因此更清楚地了解这次革命的错综复杂的背景,以及新的共产党政权从创立那天起就面对的棘手的困难和束缚。

玛丽·格莱尔·白吉尔  
2003年11月于法国巴黎

## 前 言

棉纺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自1890年首创上海机器织布局后,它和其他近代工业一样,经历了重重艰难,取得了缓慢发展。上海是全国棉纺业主要生产基地,研究上海棉纺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以往,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作过许多研究,其深度已达到对设备具体数量和各个厂名的精确的考证,但这些深入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对1937年以后棉纺业的研究缺乏深度的原因,在国民党时代主要是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影响研究人员的正常工作,战争的需要又迫使一些专业研究人员转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造成研究活动无法展开;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研究以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欺压为主题,以致于直到1979年以前的30年中,很少有客观地研究民国经济的著作问世。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打开了研究领域的许多禁区,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惜的是,在大陆众多出版物中,仍很难见到针对1945~1949年期间中国经济史或主干工业史深入研究的专著。因为这四年始终处于动荡中,抗战胜利的兴奋还未完全消失,内战的阴影已经悄然来临;国民政府雄心勃勃的战后和平建设大纲尚未落实,战时经济政策已经取而代之;民营企业梦寐以求的发展计划稍有眉目,层层管

制措施已经虎视眈眈。一切都在重建中就被战争再次侵袭扼杀,一切都在非正常环境中延续。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段历史只留下一堆残缺不全的记录,这些档案就是国民政府经济状况的见证,即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彻底崩溃。结论似乎早已铁定,研究的兴趣也难以持续。

近年来由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座东海之滨的城市重新引起了世界的特别关注,研究上海也成为学术界的时髦。更多的欧美汉学家们投入了对上海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国内学者也不甘落后。随着上海史的深入研究,也逐渐涉及到这时期的上海经济史。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们也作了相关的研究和论述,不过仍然属于极个别现象,而且研究趋于表面化。其中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仍是受习以为常的概念的束缚,以致使用的资料和分析的观点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十多年来,我在欧洲和美国曾想方设法寻找国外对这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发现欧美汉学界对这段中国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国共内战和通货膨胀,其他方面很有限。因此我决定把几年前用法文完成的以1945~1949年上海棉纺织业的发展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改写成此书,其目的在于希望能对推动这段经济史的研究略尽微力。选择这个论文题目的意义在于:1945~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是一个双重过渡的时代,即从日本占领过渡到国民党统治,又从国民党的失败到共产党的胜利。这些重大的政治转折给中国经济,尤其是对近代中国第一工业——棉纺织业,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为其经济形态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1945年为界,在此之前是华资纱厂和外资纱厂竞争的时期;在此之后主要是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并存的局面,并且这种现象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一直持续到1956年才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而告终。事实上,尽

管政权的变更,1945~1956年的经济形态仍然有其连续性。在某种意义上,企业从私有化到公有化的过渡不是共产党单独完成的。对国共两党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个过程。当然,我的论述因限于论题,只能就1949年以前的经济状况作些分析。

回顾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它的诞生并不单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后急剧刺激下的早产婴儿。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以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软弱为背景的,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打破了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同时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但这也造成了民族工业致命的先天性弱点,即缺乏雄厚的资本。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产生后,从清朝到民国,它们很少得到国家的扶持,相反的,常常受到国家的阻碍和压力,这就使它们始终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经不起强大的外国势力的竞争。棉纺业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行业:从中国近代棉纺工业的兴起到日本战败为止,中国纱厂的竞争对手是外资企业,尤其是日本纱厂。据樋口弘著《日本对华投资》、多谷泰三著《事变后的中国纺织业》及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编《中国棉纺统计史料》等著作记载,1911年日本大阪的内外棉公司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纱厂;25年后的1936年末,15个日本棉纺集团在中国共设立48家纱厂,设备总数接近华资纱厂。当年,整个日本全部纺织设备的20%在中国,其中的60%在上海,占上海棉纺业总设备的一半多。日本在华的纺织经营直接涉及到日本本土的利益,它们利用资本上的优势不择手段地与中国纱厂竞争。而一旦棉纺业发生危机,中国纱厂因资本周转不灵而成为败家的不止一个。1934年上海申新集团因资金困绌而陷入停顿,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中国纱厂的生存全在日军控制中。当然,在1938~1941年的“孤岛”繁荣期间,华资纱厂第一次在竞争中占优势。这并不是日本纱厂减少了竞争力,而是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民族情绪导致日本纱厂失去了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而在竞争中失败。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然而,繁荣终因日本的封锁内地交通而消失。以后,日军对中国纱厂的原棉供应实行更严厉控制,又低价收购中国纱厂的产品。到中日战争结束前夕,1945年2月,上海华资纱厂纱锭开工率为8.1%。<sup>①</sup>因此对中国纱厂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日本纱厂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纱厂不仅退出了中国市场,退出了东南亚市场,也退出了世界市场。这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纱厂的强大的竞争对手不复存在了,东南亚市场都由中国控制了,而且由于日本是世界上纺织品主要出口国,它在世界市场上的消失引起了纺织品的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的局面。中国纱厂面对一个从未有过的发展机会。这是近代棉纺织业在中国创立以来外资企业第一次退出与中国纱厂竞争的时期。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只有3家外国纱厂(实存2家)——英资纶昌和怡和,拥有的纱锭数占上海总数的2.2%(占全国总数的1%),在中国棉纺织业中已不起任何作用了。<sup>②</sup>

上海棉纺织业者满怀信心迎来了和平。从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扬眉吐气过。中国终于被公认为世界五大国之一了。西方国家都忙于自己的建设去了,中国已无外资竞争之忧,可以大搞建设了。纱厂主认为,以战时“孤岛”繁荣时期积累的资金和实力为基础,他们可以大显身手了。他们以为他们在战争中支持过政府,现在该是政府支持他们的时候了。他们各自做着发展计划,以为日本人留下的纱厂可以作为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的赔偿。然而他们

忽视了现实,即内战的危机仍旧存在,他们也没有想到,战后中国棉纺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国营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营和民营并存的时期开始了。

国民政府对于战争的胜利感到兴奋,对经济形势也过于乐观,由此造成了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一系列的判断失误。庞大的政府机构重建计划化费了大量的资金,而国共两党不可调解的分歧又促使内战爆发。国民政府刚刚从中日战争中解脱出来,又马上投入内战。巨大的军费开支使政府的赤字急剧上升,通货膨胀。事实上,1945年8月以后的国民政府仍处于战争状况中,它已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私人企业发展生产了。相反,它需要经费支持打内战。

国营纺建公司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它的存在使得对这时期的棉纺史研究触及到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国营企业的性质。在现实中,对纺建的批判是与它的创立同时并存的,它历来被指责为政府与民夺利的工具,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摇钱树,筹措反共内战军费的主要来源,它的经营管理被批评为极为腐败,贪污中饱之风盛行,挥霍浪费严重等等。国营企业是否是少数官僚的私有财产?

① 上海工商联会档案,第30卷,第1~69号。

② 《全国棉纺织厂调查统计》,美援花纱布联营处,1949年,第9页,第14页。

纺建公司的经营管理内幕如何?1978年12月,上海棉纺织业有关部门为了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并试图对纺建的创立作更深刻的了解,曾派专家访问了回国休养的前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一任副总经理李升伯。李升伯,这位曾为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竭尽全力的著名人士,却不提及纺建公司。他以此来表示对历年来对纺建的政治性批判的不置可否?<sup>①</sup>究竟如何评价这个国营企业?

追随这段时期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我们看到各纱厂利用战后棉贱纱贵、市场扩大的有利条件尽力生产,发展极为迅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在中国近代棉纺织业60年历史中经历过三次繁荣时期,1946年到1947年的繁荣是最后一次,也是纱厂获利最大的一次。按照棉纺织业行内人的习惯说法,仅1946年一年中,每只纱锭纺的纱所得赢余可以买一只新纱锭,即按当年上海民营纱厂拥有120万锭计算(参见附录表12),民营纱厂赚的钱可以再买120万纱锭。但好景不长,上海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很快就结束了。1948年初,棉纺织业的繁荣时期彻底结束了,继而进入萧条。其原因究竟何在?

仔细分析这一时期棉纺织业的生产,可以发现没有一个民营纱厂被国营纱厂竞争挤垮或亏本的,真正损害过民营企业利益的则是国民政府后期的管制政策。战后政府对棉纺织业重操控制政策始于1946年8月。当时由于外汇官价调整引起了市场的波动,政府想以控制纱厂部分产品销路和售价的方式来平稳市场。然而市场上供不应求,内战扩大,通货膨胀,黑市活跃,市价始终不能稳定,结果政府对棉纺织业销售的控制越来越严,发展到1947年控制纱厂50%产品销路和售价的程度。同时,由于外汇供应日趋紧张,国棉供应因内战关系运输困难,国民政府把外棉和国棉的供应完全控制在手中。很明显,这种控制形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政策的重演。民营纱厂曾通过同业公会几

次三番与政府谈判,要求政府放宽对销售的限制和原棉的控制,试图获得相对的企业自治权。但是随着内战的节节失利,国民政府日益加紧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扼杀了民营企业最后的一线生机。

在1945~1949年间,民营企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从合作逐渐走向对抗。1946年管制政策实行初期,上海纱厂所属的第六区棉纺同业公会还根据政府的要求,负责处理棉纺业联合低价售纱事务。到1947年1月,政府控制纱价趋于严厉,民营纱厂认为其自由经营权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一致反对,四名参加政府纺管会工作的民营纱厂代表因此辞职以示抗议,充分显示了他们与政府不合作的意愿。不过,民营企业仍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管制机构的工作人员保持特别的联系,以便在各种管制政策的缝隙中得到好处。

在此期间,民营企业与纺建的关系也同样发生变化。当初纺建成立时,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要求各纱厂派人参加纺建经营。民营纱厂为了日后可以拥有这些原日本纱厂,纷纷派专家和技术员去工作,组成了纺建强有力的管理阶层。然而纺建日益成为政府实行管制政策的工具时,民营纱厂和纺建就有了利益冲突。

① 李升伯访问录,1978年12月25日。王子建私藏档案。

与此同时, 纺建和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纺建的管理人员希望按正常的企业经营方式来运行, 而政府对它各方面的干扰过大, 引起这些技术官僚很大的不满。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1949年共产党进入上海前, 纺建的总经理能和共产党配合, 阻止把纺建的全部财产运往台湾这一事实。国民政府用行政手段不合理地干涉纺建的生产的结果, 只能阻碍其发展, 并增加管理人员的反叛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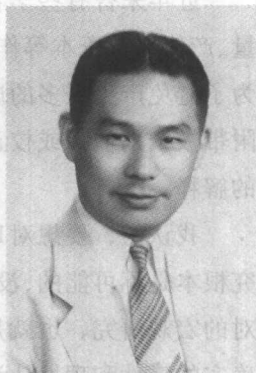
过多的政治评论替代了历史的陈述, 这是至今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对1945年以后的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问题。三种类型的资产阶级的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把对这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纳入某种教条主义的规范中, 而许多与政治概念矛盾的事实又使人困惑。鉴于已存的研究成果中缺乏对这段历史的较为完整记叙, 本书的目的在于重现这时期的上海棉纺织业, 着重于对这段历史的尽可能详细的陈述, 并用尽可能接近事实的统计数据来说明纱厂的经营情况。在文中, 我也用了“民族棉纺工业”这个词, 这里的民族工业指的是中国资本的工业, 区别于外国资本企业, 与政治观念无关。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的范围仅局限于机器棉纺织工业, 不包括手工纺织工业。

在此研究中, 最大的问题是资料的缺乏和数据的虚假。资料的缺乏来源于研究的缺乏。我有幸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了王子建先生的指导, 他长期从事棉纺业研究, 对上海各纱厂的情况极为熟悉, 我们曾在一起研究中国棉纺工业。<sup>①</sup>关于本书的参考资料, 主要有1945~1949年间出版的棉纺业专业期刊杂志以及一些报告和书籍; 上海工商联档案室保存的同业公会档案(现已移交上海市档案馆保存); 1978年对健存的原上海各纱厂的老板及负责人所作的采访记录和及他们的回忆录; 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编写的四大纺织集团的史料

(统益、安达、丽新、达丰),以及已经出版的企业史、资料集等等。

数据的选用是本书存在的最大的难题。我们所能寻觅到的统计,包括同业公会档案中的有关统计数据及其所作的各类调查,以及正式官方组织(如美援花纱布联营处)的调查统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而各纱厂自己填写的报表中出入则更大。除了统计方式各异外,虚假是这时期特别严重的现象。1937年以前,华商纱厂联合会每年做一次全国纱厂调查,一般纱厂都能具实上报生产情况,尽管统计和调查方式的落后使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这些报告仍有可用之处。而1946年以后国民政府对纱厂的控制与纱厂的生产直接有关,以至纱厂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愿具实上报生产实况,造成了各类统计中的矛盾。同时,纱厂的暗账和资金外流,使纱厂的资本和利润都没有一个可靠的数据。本书中困难最大的就是设法核实各种数据,而让读者最感困惑的也是这些数据。

我们知道在关于1937年以前的经济史研究中往往采用推算的方式来估计个别工业或企业的产量、产值及其它与企业相关的资本、利润等等,这种方式在设备持续正常



王子建(1905~1990)  
(摄于抗战胜利后)

① 王子建,1937年前在中央研究院长期从事棉纺织业统计和研究;1945年为经济部苏浙皖特派员办公室专门委员,主持接收前日本纱厂及复工事宜;1946~1949年间参与国民政府部门管制棉纺织业的工作;1949年以后为资方代理人,棉纺织业同业公会负责人之一。

运转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的,而1945年以后连我们借以推算的可靠的基数都不存在。确切地说,这些推算基数在1937年以后就很难找到。王子建曾试图用推算的方式对抗战时期的华资纱厂的生产情况作若干估计,结果他的推算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如在作“孤岛”时期华资纱厂的利润估计时,他使用的推算基础是:第一,资料证明当时华资纱厂所有的设备全部开足了;第二,盈利推算的基数为个别华资纱厂的最低利润额。由此作出的华资纱厂的最低利润总数估计尽管不是精确数目,但足以能够说明问题。而他对产量的推算就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这将在书中有关章节作详细分析。

近年来曾有些学者试图对1945年到1949年间上海棉纺织业的产量、产值以及资本等作推算,但得出的结果也都不具有说服力。所以为了避免产生更多的虚假数据,本书决定引用现存的统计数据,其中附带极个别估计或校正数据。这在本书论述中的相关部分都有专门的解释。

我认为,要想对1945年到1949年的棉纺织业作任何考据式的研究根本是不可能的,没有基础。能够做的只是相对的实质性研究,相对的宏观研究,也就是说通过研究对当时棉纺织业的情况有一个更确实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由于感性认识的基础仍只能由数据来体现,我对论证中引用的每一个数据都经过反复的核实,这是非常化费时间的类似考证的工作。我能够保证的是书中采用的都是相对来说尽可能接近事实的数据,至少这些数据都是当时最保守的最低值,没有任何夸大。我觉得最低值总比扩大值让我安心些。记得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在座者公认这是难度相当大的答辩会,因为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我在对所引用的资料和数据的真伪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作解释。我坦然地承认,论述中引用的可能是缩小的统计数据,但总比使

用扩大或走样的数据可靠些,更能说明问题些。通过这些数据,纱厂的生产情况与发展趋势仍明显可见,其他一些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对这时期的统计要求精确到1937年以前的水平,那是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这本书迟迟不能脱稿,也起因于对引用数据的再三核实和推敲。事实上,在严中平撰写《中国棉纺织史稿》的年代,对棉纺织业的统计数据已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了。况且到了1946年以后,当若干纱厂的产品进入了非正常的销售渠道包括走私南运时,任何与生产相关的统计出现不真实的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本书中相关的统计数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然而通过对1945~1949年上海棉纺织业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段历史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吸引我对这段历史做追踪研究的原因是,我的家庭与纺织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的伯父和父亲一辈子生活其中,除了抗战时期被迫改行。从童年起,我就听父辈们谈论纺织界的人和事,我也熟知这些留在上海的元老们。使我产生极大的兴趣,尤其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纱厂主和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在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没有离开大陆?为什么1956年的公私合营运动能在上海迅速地完成?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社会的、经济的或者个人原因?国营单位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追究,把我引到了本书的主题。